

傳記文學

要目

- ▲ 罗荣桓在山东
- ▲ 张大千传
- ▲ 横戈马上
- ▲ 乔治·哈特姆——马海德医生



2

《罗荣桓在山东》

介绍了抗日战争初期罗荣桓奉党中央指示，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的战斗历程以及扩大、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巨大成就。

傳

《横戈马上》

这是杨得志同志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它丰富多彩地描绘了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战役、事件和人物，感情诚挚深厚、文笔朴质流畅。

記

《张大千传》

追溯了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文中展现了他在青年时代的坎坷经历、在事业上的追求创新以及他遍游祖国名山大川以攀登艺术高峰的坚实足迹。

文

《乔治·哈特姆—— 马海德医生》

由路易·艾黎撰写。马海德从青年时代便来到中国，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半个世纪来，他矢志不渝，勤勤恳恳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學

总第2期

《张大千传》即将出版

张大千是我国著名国画家，一九八三年逝世于台北。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与齐白石先生共享“南张北齐”的美誉，六十年代，又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公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他的画在世界各国展出次数居我国画家之首，祖国的名山大川乃至世界各大城市都遍布了他的足迹。那么，他是怎样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他的艺术风帆又是如何起航的？本书生动叙述了张大千八十四年丰富多采的人生经历，刻画了他豪放不羁、坦荡旷达的性格特点，特别是对他的艺术探求和成就做了深刻阐述。内容真实且富有情趣，文笔优美而不失严谨，适合于文学、美术、历史爱好者阅读。本书作者杨继仁，全国美协主席吴作人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张大千传》为大32开本，分上、下两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估价4.70元，计划今年十月份出版。请有关读者速到当地新华书店定购。

传记文学

第二期

编辑者 传记文学编辑部 印刷者 北京纺织印刷厂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出版者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总发行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社科新书目118—122〕 统一书号 10228·127

定价 1.45 元



芍药图(国画)

张大千

传记文学

目 录 第 2 期

传 记

- 罗荣桓在山东 李维民 1
- 张大千传 杨继仁 36
- 乔治·哈特姆——马海德医生 路易·艾黎 172

回 忆 录

- 横戈马上 (选载) 杨得志 187

罗荣桓在山东

李 维 民

〔编者按〕 抗战八年，罗荣桓同志在山东将近七年。他在一九三八年冬率领一一五师向山东敌后进军，到一九四五年初冬率领山东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在这七年里，他为创建、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里选载的是《罗荣桓在山东》的头几章，写的是罗荣桓同志初到山东时的情况。

本文题字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所题。

从山西到山东

—— 一九三七年，罗荣桓三十五岁。“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罗荣桓正在延安担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七月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任命他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匆匆离别了结婚刚两个月的妻子林月琴，直奔一军团驻地——陕甘边界的正宁县宫和镇。罗荣桓在一九三二年就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长征中又担任过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他三到一军团政治部工作。

这时，部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出征的准备。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战爆发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八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

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是林彪，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开始由于受国民党限制，取消了政治委员，政治部也改称政治训处。十月二十二日又按照我军传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各师政治部名称，聂荣臻任一一五师政委。

和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现在要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党内军内有很多同志想不通。罗荣桓到部队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指战员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把政治部的干部派到各个部队去，广泛搜集部队的思想反映，由政治部编写讲话提纲发到连队。他还亲自深入到改编前的红四师十团，听干部汇报，找战士谈心。在一个星期内，几乎到了这个团的每一个连队。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战士们都乐意向他说心里话：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了咱们多少同志，咱能忘了吗？”

“我们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的，打来



打去，咱也要戴‘青天白日’帽徽了，还有什么脸去见乡亲？”

战士们围拢在罗主任周围，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罗荣桓从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话，总是耐心地听大家把话讲完，才象拉家常那样，慢条斯理地说：

“同志们，你们想的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开始我也搞不通呢！我去找过毛主席，毛主席说服了我。”

接着，他分析了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新变化，说明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已上升到首位，只有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赴国难，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同时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永远不能忘记革命的最终目的。红军改编的八月，正是我军建军第十周年，中央发给每个红军老战士一枚建军十周年纪念章。罗荣桓很珍惜地把纪念章

佩带在胸前，他谆谆告诫同志们：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罗荣桓这位奋斗了十年整的红军老战士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是最有说服力的。

整装待发的一一五师，下辖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和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以及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和几个直属营，全师共一万五千五百余人。

八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聂荣臻都去开会了。八月十九日，中央命令罗荣桓和陈光旅迅速开赴山西前线。他们于八月二十二日从陕西三原、泾阳一带出发，经白水，从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九月七日在山西侯马登上火车。罗荣桓把部队进军途中的政治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他要求各部队进入国民党区域后，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他组织政治部宣

传队的同志，沿途进行宣传鼓动；交代锄奸部的同志做好巩固部队工作，保证全体指战员安全开赴前线。在行军途中，在黄河渡口，在军用列车上，不时看到罗荣桓忙碌的身影。赶赴前线的指战员们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

从疾驰的军用列车上，不时传出威武雄壮的歌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罗荣桓和大家一样，抱着决一死战的献身精神踏上了征途。九日到十二日部队在赵城休息。罗荣桓这位早已以天下为家的老战士，也想起了要对家庭子女作一次上战场前的告别。他在登车继续北行之前，向邮局投交了寄给湖南老家他二哥的一封信。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

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信，幸而投递到了，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玉英是罗荣桓前妻生的女孩。一九二七年罗荣桓离开家乡投身革命时，玉英还不满周岁。这封简短的家书，洋溢着罗荣桓为争取民族解放视死如归的革命激情。

日寇攻占宣化、大同之后，分两路南下。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节节败退，退到了平型关、茹越口一线。一一五师到达晋东北后，即向平型关一带进发。求战心切的指战员，个个象拉满了弓弦上的箭，师政治部的同志也不甘落后，都想赶到前线去参加战斗。可是走到龙泉关，已赶回部队的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师的主力北上了，罗荣桓却带着政治部的大部分干部，包括师政宣传队的同志，改道东去，走向河北省的阜平县。他们为什么东去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给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发来如下指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还谈到：林彪率陈光旅暂时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是可以的，但是“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罗荣桓就是根据这个战略方针，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第六连，插向敌人的侧翼，到晋冀两省交界处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一行到达阜平后，离前线很近的人心惶惶的阜平城，立即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宣传队员走上街头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大街两旁的墙上写满了抗日标语，还画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漫画。政治部的干部到群众中宣讲我党抗日主张，常常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罗荣桓还派出一批干部，分散到周围农村去做宣传工作。群众抗日团体如雨后天春笋，很快在各地建立起来，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加游击队，不到一周时间，全县就组织起有四百多人的“抗日义勇军”。日寇侵占石家庄后，国民党的阜平县长兼保安队队长张仲孚慌了手脚，卷起铺盖，连夜逃走。罗荣桓当即决定让晋察冀临时省委派来阜平工作的王平接任县长兼保安队长。第二天，罗荣桓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前呼后拥把王平送进了县衙门。

十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在平汉线活动的师骑兵营，乘敌不备，发动突然袭击，解放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之后，从敌伪手中解放的第一个县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统战部长潘振武率领宣传队，赶往曲阳县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任潘振武担任了曲阳县县长。阜平和曲阳的县政府是我军对日作战中最早建立的一批抗日民主政权。曲阳县城靠近平汉铁路，敌人设立了一个兵站，囤积了大量军用物资。一箱箱的饼干、罐头堆积如山。潘振武发动曲阳男女老少，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几天之内就把缴获的物资全部运到阜平。

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的胜利^①，再加上解放曲阳的喜讯，给当地老百姓极大鼓舞。在祝捷大会上，战士们把缴获的饼干堆放在主席台上，到会的群众亲口品尝着胜利品的味道，欢欣鼓舞的青年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在罗荣桓统一领导下，冀西一带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骑兵营解放曲阳后乘胜东进，又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他们在战斗间隙以班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到十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周围各县的义勇军已发展到四千多人。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留下师独立团、骑兵营和另两个连共约两千人，由聂荣臻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向聂荣臻介绍了阜平一带的情况，并协助他搞了一段军区组建工作。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阜平成为军区机关所在地。罗荣桓结束了在阜平的工作，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先在山西五台县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兵员。然后南下，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晋西南的洪洞、赵城地区，与一一五师司令部会合。

二 聂荣臻留在晋察冀边区之后，事实上不能兼顾师政委的工作，一一五师政治工作的领导重任，自然落在罗荣桓的肩上。可是，林彪屡次要求另派政委。显然，林彪对罗荣桓是看不起的。难怪在十年内乱时，尽管罗荣桓已经去世，林彪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罗荣桓总是兢兢业业地埋头于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一九三二年到三三年，他在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因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被调到江西军区。一九三四年秋，又调他去新成立的八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都是过去在他领导下的干部。罗荣桓毫不计较，愉快地服从

组织的决定，在军团长和政委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当时有些同志认为组织上安排不公平。罗荣桓知道后对他们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讲那些影响团结的话。他这种磊落的胸襟，使同志们深受教育。现在，他的处境虽然并不顺利，但他仍然抱着以大局为重的想法，把全师政治工作的担子担起来。

一一五师由晋东北南下时，三四四旅即归十八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以下称集总）直接指挥，继续在正太路沿线活动。随师部南下的三四三旅（旅长陈光，政委肖华），下辖两个团：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和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这两个团在平型关、广阳^②等战斗中伤亡比较大，有的连队剩下不到一半人。广阳战斗后，师部派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及师直和各团的一批干部到晋东南扩兵。罗荣桓回到师部时，杨勇他们也带着新扩充的大批新兵陆续回来了。师部立即组织了三四三旅的整编。首先把六八五和六八六两个团的兵员补满，又从这两个团抽出一部分干部和少数连队作骨干，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团。由六八六团三营长邓克明任团长，团政治处主任符竹庭任政委。从此，三四三旅扩大为三个团。

日军攻占太原以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即已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我军的主要任务，从配合友军作战，变为在敌后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一一五师率三四三旅在晋西的汾河流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吕梁山地

① 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设伏，歼灭了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一千多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② 广阳战斗：1937年11月4日至7日，一一五师和二九师的部队，先后在山西昔阳以西广阳镇一带，连续伏击沿正太路进攻太原之日军的左路部队，共歼敌千余人。

区、巩固战略枢纽的指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转向汾西、灵石、孝义地区。这时，由太原大举南犯的敌人兵分两路，一路沿同蒲路继续南下，另一路西犯蒲县、隰县，追击向西逃跑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部队，直逼大宁，企图占领马斗关黄河渡口，窥伺陕甘宁边区。大宁县城距黄河只有二十多公里，距黄河西边的延安不过一百多公里。为了钳制和消灭西犯黄河河防之敌，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主力部队随即向隰县、大宁一带开进。罗荣桓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在部队中积极进行政治动员，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响亮口号，大大激励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三月二日，一一五师直属队经过隰县以北阎锡山十九军的防区。因林彪的随行人员有的穿着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洋马，十九军哨兵以为是日本人，开枪误伤了林彪。罗荣桓当即报告集总和中央军委。当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之后，根据集总决定，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六八六团团团长李天佑代理旅长，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兼代团长。一一五师的全面工作，实际上仍由罗荣桓负责。

罗荣桓派人将林彪转送延安之后，即与陈光指挥由代旅长李天佑、政委肖华率领的三四三旅，迅速进至蒲县至大宁公路一线。这次不是用大部队与敌人的主力作战，而是用游击战的“拿手好戏”，在敌人已占领的大宁的侧后方，将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预伏在道路曲折、地形复杂的午城、井沟一带的若干阵地上，打击敌人之补给运输部队。战前，罗荣桓与陈光亲自察看地形，到每个阵地进行部署和检查。从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指挥预伏在各处的部队，此起彼伏地向在蒲县与大宁之间补给线上活动的敌人，连续进行袭击，平均一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两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转移到别处打。连续

打了五个昼夜，共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给猖狂西犯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严重破坏了敌人的后方交通线，使进占大宁、逼近黄河的敌人后撤，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威逼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午城、井沟虽然不象平型关和广阳战斗那样出名，但是这次战斗充分发挥了我军善于打游击战的优势，取得了用兵少、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是贯彻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一个模范战例。

午城、井沟战斗之后，卫立煌率领他的指挥机关过黄河东来，他们刚到大宁，就遭到敌人猛烈阻击。根据卫立煌的要求，我一一五师部队积极进行掩护，罗荣桓还派司令部侦察科长苏静前往联络。当卫部被敌人打散时，我六八六团三营十一连，在连长王永禄指挥下，在白儿里抵住了八百多敌人的轮番进攻，把卫立煌救了出来。卫立煌非常感激，战后特地送给我军一百挺轻机枪、十万发子弹，表示酬谢。

阎锡山的晋军这时纷纷过黄河西去。罗荣桓与陈光率领部队又转到汾阳、孝义一带，继续坚持晋西敌后游击战，开辟吕梁山根据地。

吕梁山在黄河与汾河之间，南北长达四百公里，海拔一千五百到两千米，构成晋西高原的骨干，恰似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汾阳、孝义位于吕梁山脉的南部，根据以杨尚昆为书记的北方局的统一部署，罗荣桓从部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把师政治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派往石楼、永和地区，组织游击队，以便控制吕梁山脉南段。

从延安抗大来到山西八路军办事处主办学兵大队的何以祥，根据北方局指示，也到晋西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他从学兵大队带来十多个学员，都被各县要去了，他既缺人又无枪，不知从哪里做起。有一天，他带着晋西区党委的介绍信去请示罗荣桓，罗荣桓鼓

励他说：

“人是不缺的，干部也不用愁。”

“在哪里呢？”

“不在我这里，在人民群众中间，你要去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干部。”罗荣桓接着具体交代：“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时，在汾阳、孝义、灵石一带撒下一些‘种子’，有的党员现在隐蔽起来了，你要到每个村、每个区去找，很快把党组织恢复起来。阎锡山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在山西各县都设立了牺牲同盟救国会，现在这个组织得到了我党的帮助和支持，你要和各地的牺盟会取得联系，其中有很多进步分子。而且阎锡山的地方政府中，甚至在县长、科长里边，也有进步分子，你要学会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抗日。同时还要做青年工作、妇女工作，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何以祥从罗荣桓那里没有得到人和枪，但他得到了办法和信心。他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从秘密串连到公开活动，团结的群众越来越多。何以祥又去师部汇报。罗荣桓鼓励他：“你做得对，有了朋友，胆子就大了；有了群众，办法就有了。”果然，不过两三个月，人有了，枪也有了。何以祥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又得到了一些地方上进步人士的帮助，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撤退时丢下的几百条枪，把新发展的游击队员全副武装起来。为了组建这支部队，罗荣桓还派一一五师的干部去传授经验，训练干部，派宣传队去演戏、慰问。又组织这支部队的新干部到一一五师学习。这支白手起家的晋西南游击一、二、三大队，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

部队在晋西，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抗战爆发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外界的影响，再加上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在山西还收容了一部分国民党的溃兵，部队成分比过去复杂，政治素质有所下降。罗荣桓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他拿出大部分精力，组织部队整训，开展了反军阀土匪主义

的教育，整顿了纪律，健全了各种制度，使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九月，日军为配合进攻武汉和“扫荡”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向山西增兵一万余人。敌一〇八旅团，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并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黄河渡口军渡，企图西渡黄河。我陕甘宁边区再次受到严重威胁。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这次仍然象在午城、井沟那样，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把部队分散预伏在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两侧。这条公路是横越吕梁山脉的交通干线，敌人全靠它向其西进的先头部队补充人力和物资。九月十四日、十七日，我军分别在薛公岭、油房坪给敌人的运输补给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当敌人受到严重威胁后撤时，我军于十九日又在王家池伏击敌人后撤部队。这三战三捷，共毙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十六名，缴获汽车三十余辆。

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敌人，写了一封给杨勇团长转一一五师司令官的信，逼迫一个做生意的老百姓送到六八六团杨勇团长那里。信上说，他们不惯于在山地打游击，约我军到三阳镇平原地区会战。这封来势汹汹的挑战书，恰好暴露了敌人的虚弱和无能，说明我军的拿手好戏——山地游击战，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三

“三战三捷”刚刚结束，罗荣桓就接到通知，要他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除了参加会议的全体成员留下一张合影之外，罗荣桓与贺龙、杨尚昆、关向应、徐海东、肖劲光、罗瑞卿、肖克、谢觉哉等同志亲切相聚时，正遇上一个来延安的美联社记者汉森，汉森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这两张照片，现在都在博物馆陈列着。

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罗荣桓

是作为一一五师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

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王明。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又曾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一回国，就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责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尽量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军事上，他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志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罗荣桓虽然与王明没有相处过，但他对王明过去的左倾错误，是早就知道的。六中全会之前的四月间，林月琴从延安调到晋西前线工作时，曾和罗荣桓谈起这年春天她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搞机要工作时见过王明的事：

有一天，从外地来了一个干部，住在西安办事处地下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这个干部从不参加公开活动，只坐在屋里看文件，林月琴每天给他送电报。听口音，林月琴觉得很象自己的家乡——安徽金寨人。有一天，林月琴又去送电报，见到屋里坐着两个女同志。林月琴放下电报，刚要出去，忽然听到有个女同志喊：

“芙蓉！”

这是林月琴在家乡时用的名字。她回头一看，喊她的是小学时的老师陈觉民。

林月琴讲到这里，故意把话打住，问罗荣桓：

“你猜猜看，那个干部是谁？”

罗荣桓皱起眉头，想不出来。

“那是陈觉民的哥哥陈绍禹，就是王

明！”

“噢，那可是有名的人物。我还没有见过此人呢！他长的什么样子？”

“矮矮的，胖胖的，没有什么特别。”

谈起王明，罗荣桓深有感慨地说：

“过去，王明那一套给我们党造成了很大损失啊！”

九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六日，我党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的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我军要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

罗荣桓积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的会议上作了发言。罗荣桓的发言非常具体、实际，他通过汇报一一五师一年来的情况，着重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另一个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问题。

罗荣桓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一一五师在午城、井沟战斗中，如何采用以小部队打小仗的方法，利用若干个有利的阵地，此起彼伏地连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情况。罗荣桓谈到，他们以营为单位，甚至以排或班为单位灵活机动地作战。有一个排，为牵制敌人，坚守在一个小阵地上，敌人进攻很激烈，打了二三百炮，我坚守了两个小时，然后悄悄转移阵地，敌人竟未发觉。用这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收到了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他说，在井沟战斗中，敌人死伤近五百人，我军伤亡不超过一百人。罗荣桓没有拿午城、井沟战斗与平型关战斗比较，但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许多同志都记得，那次战斗下来，许多连队损失了一大半。罗荣桓用

一年来一一五师的战斗实践经验，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完全正确。

罗荣桓在发言中直率地谈到，由于部队改编时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一一五师政治部又在较长的时间作为单独行动单位远离部队，而且大批政工干部调到地方工作，因此使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军阀土匪主义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所滋长。他汇报了一一五师到晋西以后，克服政治上的麻痹情绪，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军阀土匪主义斗争取得的成果。他还认为，必须加强党支部的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他谈到在军队中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建议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特别是系统的基本教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使部队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罗荣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人之一，早在我军初创时期就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他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曾参加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因“观念正确，斗争积极”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罗荣桓在这次发言中，又用他在部队的实践经验，证实了毛泽东关于我军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四 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一一五师进军山东，就是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

山东，位于黄河下游，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且为华北海上门户，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占领平津地区后，沿津浦铁路进逼山东。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拥有十多万大军，却不作任何抵抗，一味退却逃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敌人渡过黄河，随即占领济南和青岛，使十五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山东大好河山沦入敌手。

在山东尚未沦陷之前，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山东省委，就在济南秘密制定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省委书记黎玉曾去北方局，向刘少奇、杨尚昆等汇报，接受指示。原在山东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派来的五、六个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在省委领导下，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迅速在冀鲁边、鲁西北、胶东、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山）西、鲁东南、鲁南、（微山）湖西等地，点燃起抗日烽火，发动了气势磅礴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为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山东根据地，作为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南接华中，北迫平津，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九三八年四月，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为了加强山东的领导，中央派郭洪涛和张经武先后率两批军政干部到达山东。山东省委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以后又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任书记。

当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向南推进时，在山东的兵力比较薄弱，由我党领导的各地人民抗日武装，曾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三八年底正式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下辖八个支队，共达四万余人。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的势力也极力发展武装，一时司令多如牛毛。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以后，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成为山东顽固势力的头子，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与我军磨擦。广州、武汉失陷以后，敌人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其主要兵力转移敌后，山东局势迅速恶化。日军对我军加紧了进攻，而对国民党则加紧实行政治诱降。当时在山东的日伪军和沈鸿烈控制的顽固派部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我军，而我新建部队，既缺乏

经验，又缺乏干部，武器装备更为落后，我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派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这个设想中央早就有了。黎玉在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时，曾要求中央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去。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早在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就有一批主力部队由冀南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那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二营发展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一二九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四十八个干部发展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他们是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前锋。他们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越过津浦路，进抵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区，与这个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冀鲁边工委领导人于文斌、马振华等同志，在省委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郭盛云帮助下，发动了山东人民的第一个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救国军，先后攻占盐山、无棣、庆云、乐陵等城，控制了沧县以南惠民以北的大片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敌伪和地方反动武装不断向我进攻，斗争十分尖锐，我军处境日益困难。曾国华和孙继先两个支队抵达后，与边区抗日武装联合，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攻占宁津城，活捉伪县长，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三八年七月间，罗荣桓在晋西孝义接到中央和集总的通知，调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他从大局出发，迅速抽调了一批干部随肖华前往。其中有补充团团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和在三四三旅政治部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周贯五、王辉球、王叙坤、刘贤权等，另外还从司令部及随营学校调了部分干部，共约一百余人。

肖华出发之前，罗荣桓和他谈了话。那时肖华才二十三岁。一九三〇年肖华一到部队，就在罗荣桓任政委的红四军工作，在罗荣桓的亲切教导和帮助下，肖华进步很快，早就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这次他要去统一领导冀鲁边区的武装斗争，罗荣桓还和往常一样，向他交代得非常具体、周密。罗荣桓首先谈到了那里的有利条件：有地方党的工作基础，民间有大量的枪支……。但他着重强调了可能遇到的困难。他指出，冀鲁边区处于敌后之敌后，敌伪和国民党都要和我们争夺这个地区。当时沈鸿烈虽与我们维持着合作的局面，但是罗荣桓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料定他们必会和我们搞磨擦。他要肖华做好思想准备，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

八月三日，罗荣桓与陈光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肖华率三旅政治处遵总部令拟即日东行。”肖华一行先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然后于九月二十七日抵达冀鲁边区的乐陵城，受到边区军民和乐陵县县长牟宜之的热情欢迎。牟宜之是沈鸿烈委派的县长，但他青年时代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具有抗日民主思想，他还去过延安，会见过毛泽东主席。所以他与我军合作得很好，以后将所部全部编入我军。在肖华主持下，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接着又整编了边区的部队，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曾国华的永兴支队编为第五支队，扩编为五、六两个团。冀鲁边区地方抗日武装编为第六支队，辖七、八两个团。孙继先的津浦支队调回鲁西北，后又经泰西转往鲁南地区。

肖华一行挺进山东之后，罗荣桓又接到中央决定派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去山东（微山）湖西地区的电报。他立即通知六八五团，叫团长、政委来师部领受任务，这时，杨得志团长已调任三四四旅副旅长，由彭明治接任团长。邓华留在晋察冀军区以后，吴法宪（当时叫吴文玉）接任政委。彭

明治和吴法宪赶到师部以后，罗荣桓与陈光一起向他们交代了东进的任务。在一孔普通的窑洞里，彭明治和吴法宪坐在炕前的一条板凳上，罗荣桓坐在土炕上，详细地交代着进军途中和到达以后需要注意的各种问题。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远离师旅领导，去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斗争。彭明治参加过南昌起义，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师参谋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吴法宪坐在他身旁。罗荣桓问吴法宪：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还是个娃娃，第一次出远门，自己当家作主，可不容易呀。你们把这三千六百人的队伍带过去，要不断发展壮大，可不要搞垮掉！”罗荣桓显然有些放心不下。

六八五团要去的湖西地区，即微山湖以西地区，这里是苏、鲁、豫、皖四省边区，逼近徐州，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战略位置很重要。罗荣桓对那一带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他交代彭明治和吴法宪，要先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还会具体地交代任务，介绍情况。他叮嘱说：我们部队习惯于山地作战，这次是去平原，要注意学习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平原作战要依托村庄，村庄里住的是老百姓，我们要站住脚跟，最重要的是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尊重地方党和游击队，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要和他们搞好团结。罗荣桓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多、很细，吴法宪在小本本上也记了不少，但后来发生的湖西事件证明，对罗荣桓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吴法宪作为政治委员，并未很好地贯彻执行。

六八五团离开晋西以后，在八路军总部进行了一段休整，然后继续东进，改称苏鲁豫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底抵达湖西，与当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会合。这里的党组织是苏鲁豫特委（后改区党委），归山东分局领导。六

八五团是一一五师第二批进入山东的部队。

由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两个团（六八五、六八六团）全部进军山东，这个部署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最后定下来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就此再次致电集总，十二月二日，集总正式电告陈、罗。罗荣桓从延安回到晋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部队东进的准备了。

根据晋西斗争的需要，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部队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暂时留在晋西，依托吕梁山，开展敌后游击战，建设根据地。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调去任支队长，林枫兼政委，黄骅为副支队长，刘德明为参谋长，王麓水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团由补充团编成，团长杨尚儒，政委刘振球；二团由晋西南游击一、二、三大队编成，团长何以祥，政委曾明桃。

除独立支队以外的一一五师各直属单位和六八六团，均于十二月中旬从晋西出发，向山东挺进。

五

离开了晋西灵石县双池镇，罗荣桓与陈光率部队于十二月二十日夜，冒着纷纷大雪，越过了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来到绵山西面的尹房村。部队在这里稍事休整，进行翻越绵山的准备。绵山，在山西介休县东南。相传春秋时晋国的介之推，曾和他母亲隐居在这座山上，晋文公烧山逼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出来，被大火烧死。绵山因此而出名，所以亦称介子山。罗荣桓望着那铺满皑皑白雪的绵山，很自然地会想起长征时爬雪山的情景。这绵山虽然没有雪山那么高，但那时是烈日炎炎的夏天，如今却是寒风凛冽的严冬。而且部队中补入许多新战士，翻过绵山也不是易事。罗荣桓要求各级干部向部队进行深入动员，做好爬山的各项准备。经过长征的老战士，向新同志介绍了爬雪山的经验。为了防冻，每人还准备了一点生姜，有的还用破布包住脚。

二十六日一早，罗荣桓就率部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踏着积雪，冒着寒风，向山上进发。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崎岖狭窄，而且地上还有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越往上爬，山风越大，薄薄的棉衣早被寒风刺透，一直刺到骨缝里。这对爬过雪山的老红军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那些新参军的同志却感到筋疲力尽，头晕腿软。走了不到一半，有的人就走不动了，特别是刚从延安到前方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更觉得支持不住，掉队的不少。罗荣桓和大家走在一起，他虽然身体不好，还不断给同志们打气：

“爬上去就是胜利。”从清晨爬到下午，过了“后悔沟”、“十八盘”，终于翻过山梁，到了一个温暖避风的“好地方”，有的人倒在地上，想喘息一下。罗荣桓懂得，如果在山上休息，必定会冻坏。他亲自督促大家赶快下山，并指示部队收容掉队人员。

翻过绵山以后，同志们回首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山峰，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一一五师东进的路程共有三千多里，因为途中也经历了一些艰险，所以曾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过了绵山继续向东挺进，他们在行军途中迎来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罗荣桓与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在战地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老总特地到一一五师驻地看望大家，还给一一五师干部作了一次形势任务报告。罗荣桓与师部的几个同志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总司令留他们吃饭，还亲自下伙房，抄起菜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罗荣桓在屯留县东北的常村一带，组织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这时，三四四旅也驻在附近。他们早就离开了师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奉命越过正太路，进入

晋东南以后，在一二九师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三万余人发动的九路围攻，随后又配合一二九师，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进行了十几次总破袭。新年过后，罗荣桓专程去三四四旅，亲切看望了分别一年的同志们。

罗荣桓率部继续向山东挺进时，公开使用的番号是“八路军东进支队”。这是因为：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日趋反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排斥和压迫，在山东成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总司令，辖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八十九军及山东、苏北各地方部队，并要八路军在该区的游击部队归其指挥，而要一一五师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建制。他们妄图排斥我军，控制整个鲁苏地区。

一一五师进军山东，是我党根据“独立自主”的方针决定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讲过：“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派一一五师到山东，就属于先斩后奏之列，所以开始需要换一个番号。这时，适逢鹿钟麟奉国民党的命令，袭击八路军，取消我们成立的民主政府冀南行署，彭德怀要去冀南处理此事，“东进支队”便护送彭德怀，翻越太行山，横跨平汉路，然后直插山东。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他们从鄆城县境过了黄河，踏上山东的土地。

齐鲁大地及时雨

“一天经过三个省，走过黄河没湿鞋。”这是东进支队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边界地区跨过黄河、进入山东之后，有的同志对当时行军情景的风趣描绘。由于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炸开了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山东境内河道乾涸，所以不用湿鞋就走过来了。

过了黄河，就是鲁西地区。鲁西，可以泛指津浦铁路以西的山东西部地区。抗战初期，根据各地开辟根据地的情况，山东西部这一大片又分为几块：津浦路以西、黄河以北称鲁西北；运河以东、泰山以西称泰西；济宁至菏泽公路以北、运河以西称运西；微山湖以西称湖西；山东的西南角即菏泽一带称鲁西南。由于没有明确的界线，说法往往不尽相同。罗荣桓入鲁时首先到达的即运河以西地区。

抗战爆发后，运西这一带，虽有我党的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没有我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弄得民不聊生。当地群众听说东进支队过了黄河，犹如久旱逢雨，马上选派了二十多名代表去迎接东进支队。

由一一五师师直和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支队，是由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指挥的。当时人们还习惯地称罗荣桓为罗主任，但据许多同志回忆，在东进时，罗荣桓已担任师政治委员。从现在查到的文献资料中，虽未看到任命时的电文，但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朱德、彭德怀关于一一五师主官姓名和人枪数目报告中标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

东进支队进入山东后，罗荣桓和陈光决

定，首先要打一个胜仗，回答群众的期望。驻扎在郓城的汉奸头子叫刘本功，他侄子刘玉胜掌握的一个保安团，驻在郓城西北的樊坝，这是刘本功的主要支柱。罗荣桓与陈光研究，要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并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六八六团，由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

杨勇领受任务后，立即进行战斗准备，在全团进行了争取打好入鲁第一仗的动员。三月三日晚上，部队冒雨向樊坝急进。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勇猛冲进敌人据守的围寨，将守敌全歼，伪团长刘玉胜被我生擒。驻在樊坝西南团柳树的刘玉胜的第四连，慑于我军威力，听从我军规劝，携带五挺机枪和全部武器，光荣反正。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我军在鲁西声威大振。“老八路来了！”这喜讯在鲁西平原上迅速传播开来。

杨勇骑马赶到张集，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战斗情况，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罗荣桓没有急于答复，他亲自审问了刘玉胜。

刘玉胜是本县人，以前曾在宋哲元部队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复榘部队当校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委以连长。山东沦陷以后，刘本功当了汉奸保安司令，刘玉胜也跟着当了伪军团长。刘玉胜的岳父在樊坝战斗中被枪弹穿透肺部，我军医务人员精心为其医治，刘玉胜深受感动，而且有些悔罪的表示。

罗荣桓和刘玉胜谈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把杨勇找来问道：“你看刘玉胜这个人怎么办好？”

杨勇深知罗荣桓的脾气：他总是用商讨的语气，从不武断地决定。

罗荣桓沉思了半晌，然后说道：

“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

接着，他谈到党的政策，说明刘玉胜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可以